

我就是二本生



课间休息和学生在一起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的社会的真实场景。

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抛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勒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G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凑钱家里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的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人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嘴里咿咿呀呀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实用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

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洒洒扬扬,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

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无数个体的努力

黄灯用笔记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学生,她说,“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10年前,黄灯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热门的选择,其次是考公务员。像一对平行的双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学生借以出人头的支点。从早晨5点钟开始,食堂门外逐渐汇成一条队伍。因为图书馆和教室有限,学校把食堂的一层改成自习室,后来又扩大一层,备战考研的学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在所有的学生里,黄灯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从高中开始,林峰掉入武侠世界,写了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每个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工作10年了,他的头像依然是令狐冲。

这个出生在广东四会村庄里的男孩热爱电影,毕业时曾想去电影公司,但走近之后,却发现兴趣变成职业有太多无奈。“电影导演都想拍文艺

片,但80%拍的都是商业片。”有同学热衷于参加能让履历光鲜的学生会,他跑去做青年志愿者,毕业想找一份公益组织的工作却不得,最终顺应潮流流进了银行。他喜欢独处,却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他决定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没有要求‘985’‘211’,对普通大学生来讲是个机遇。”在文凭的含金量稀释以后,学生们冲向另一个看似公平的赛道。

林峰最终进入四会的一个机关,“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在筑起高墙的单位,他不用为了取悦别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工资稳定,给予他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不服输的“小强精神”

沈毅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流老板直接来学校招人,好像很重视。“定位我们是公司的重点人才”。沈毅星任职两个月就辞职了。“老板要成立航空部,让我们搞空运,高估了我们二本学生的能力,连我们的英语都没衡量一下。”没人带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到乡镇上班。“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我父母在档口卖肉。我也想搞这些,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毕业时,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延续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从乡镇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一个月只回家几天。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小强精神”,练就了把脸贴在地板上摩擦,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机会落入别人囊中。“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领导在宣布结果时,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黄灯知道,无论日常生活多么的贫乏,无论现实多么缺乏诗意,学生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去行动。黄灯觉得他们“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摘自《中国青年报》)

故事万象

能听得见山风、泉流、蝉鸣,闻得到花香、空气中的草药气息,而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范成大诗亦云:“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桂冕旗伊不动,藻井森上征。”虽设问风从何处来,但既然桂旗不动,可见非真有风,殿阁之“微凉”不过因静而生,人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其理相若。

还是白居易,他去拜访恒寂禅师,天气酷热,却见禅师在闷热的屋中独坐。便问道:“禅师,这里这么热,为何不换个清凉的地方?”恒寂禅师说:“我觉得这里很凉快。”白居易颇多感悟,成诗一首:“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原来,心静即身凉,一切皆出于心,心静自然凉。

(摘自《期货日报》)

诗林拾趣

出气
趁老婆在洗澡,我看了一下她手机,发现了她和丈母娘的聊天记录。老婆说:“今天胸口闷得慌,等会儿揍他一顿出出气。”丈母娘劝老婆道:“不要做无理取闹的事,先翻旧账铺垫铺垫。”

拆谎

父亲想放屁,但女儿在旁边,很尴尬。于是他想了个好主意,在放屁的时候大声叫喊。于是他一边放屁,一边“嗷嗷”大叫。这时,女儿问:“爸爸,你放屁的时候很疼吗?”

(摘自《中国剪报》)

开心乐园

没想到,我妈拉过女朋友说:“闺女,你这么漂亮,咋找个这样的?”

不能打

昨天,六岁的儿子把我老爸心爱的茶壶打破了,我抄起鸡毛掸子就要揍儿子一顿。老妈见状,匆匆从厨房走出来,护着我儿子道:“不能打,小孩子犯了错要好好教育。”我忍住怒火,问:“妈,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挨你揍,从来没有见你跟我讲道理。”老妈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家里穷,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哪有时间跟你讲道理呀,打一顿又快又省事。”

笑一笑十年少

补头发

一天晚饭,我做了炒猪肝,女儿不爱吃,我就哄她说:“吃肝补肝,身体好,快吃吧。”女儿听后高兴地说:“妈妈,我头发少,是不是能吃点头发补补?”

咋找个这样的

今天,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妈,这是我女朋友。我妈打量了一眼说:‘你咋找个这样的?’女朋友脸色瞬间就变了。我赶紧打圆场:‘妈,她是我女朋友,说话客气点,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人生驿站

样。所谓“2006全球幸福国家排名第六”“亚洲最幸福的国家”的说法曾广为流传,受到高度追捧。然而,这个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那些“贫困并幸福着”的笑容,很可自能是“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杰作。真相也许是山民们没有选择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

2019年联合国《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中,不丹仅排97位,处于中下水平。被传为幸福感爆棚的原因是该国国王在1980年代末提出了所谓“国家整体幸福”的政策,号称施政追求“最大幸福”。而这个国家的高度封闭让“最大幸福”成为可能——1999年不丹才有限地开放了电视禁令,而严格限制外人入境的措施延续至今。不丹山民的幸福就是因为他们国王用“使民不见可欲”塑造出来的,而后再在远比他们富裕的外国人中传颂。

被歌颂却不被追求的幸福是虚假的。不丹的仰慕者又有几人毅然投奔那“心灵的故乡”呢?如果不丹入境不便,情有可原。那么,西藏呢?一干富翁富姐们不吝夸赞,虔诚地去朝圣旅行,然而有人真正去做藏区幸福的牧羊人和牧羊女?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离开了富裕生活提供的便利,才是幸福感的损失。

当然,幸福感无疑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由于幸福感的主观性,无法客观量化,也无法在个体之间比较,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是缺乏价值的。衡量社会成就还是要回归最基本的坐标系统——经济繁荣、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个人权利的保障等。其中,经济富裕对个人幸福的作用举足轻重。这没有什么可耻的,也无须用各种鸡汤涂脂抹粉。

(摘自《南方周末》)

“贫穷并快乐着”只是鸡汤

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结果出炉。大调查显示,年收入12万—20万者幸福感最高,每10人中有6人感到幸福;年收入1万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幸福感并不是最低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的高收入人群,不幸的比例最高。

这些数据被广泛解读为“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从数据分析的角度讲,这一结论似乎是成立的。然而,稍微认真地梳理数据,就会发现“隐藏的秘密”。

首先,所谓“最幸福”的年收入12万~20万人群幸福感比例占59.94%,比年收入10万者只多了0.02个百分点。其次,年收入1万元以下者确实是年收入12万以下人群五个组别中幸福比例最高的,但也仅为45.28%。其三,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五个组别中,幸福感比例最低的是年收入30万~50万人群,但也高达56.13%。

“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的结论来自数据解读的“技巧”,有意无意地导向了“鸡汤结论”,和所有鸡汤一样,都是因信则灵。而这还不是幸福感指标的最大问题,更值得讨论的是,相差甚远的收入群体之间比较幸福感这样的主观情绪感受真有意义吗?富裕人群感到幸福的事情及由此带来幸福感是贫困者无法企及的,甚至在富裕人群的“不幸福”面前,贫困者的幸福都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幸福是主观感受,所以没有人可以反驳“花钱买不到幸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富裕人群获得幸福感的能力远远大于贫困人群。个体的经济能力意味着更多的选择,这不仅是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更意味着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后者其实更为重要,经济学告诉我们,被贫困限制的不可只是想象,还有失去的大量的机会他们没有选择。

小国不丹曾经被树为“贫困并快乐着”的榜

SHINSUN 祥生 中国地产 TOP27 更懂济阳 幸福生活 祥生东方樾 城市展厅 8月8日 风华启幕 交警大队南,新中式智慧社区 祥生地产,深耕八载,匠心恒献,三盘辉映,筑福济阳 T 8117 7766 项目地址 经二路以西纬四路以南 城市展厅 祥生中央华府营销中心